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热点聚焦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把握哪些关键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在此转换过程中，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新兴动力还在孕育期，新旧动力不能正常接续。在此情况下，我国遇到三大难题急需在宏观政策上得到破解。

一是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关键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需求侧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快变量，投资增长率在迅速下降，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明显下降，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上升、难度在增加。在消费需求方面，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不足，对中低端产品需求不足；中高收入人群在国内有效供给缺乏条件下，消费潜力受到抑制。从供给侧分析，在现有体制下，

一、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本和资源过度涌入中低端产业，造成产能过剩；而资本、技术和资源进入中高端产业严重不足，由此造成国内中高端产品供给缺乏。之所以产生供求结构性失衡，关键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比如中低收入人群对日用消费品像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等需求不足，主要是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水平低密切相关。相反，在优惠政策刺激下，各种产业园区大力吸引外来投资进入技术门槛低的中低端产业，造成供给过剩。与此同时，当中高收入人群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市场出现新需求时，在体制机制束缚下，实体经济缺乏创新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中高端产业不足，使得国内市场上中高端产品供给受到严重抑制。

二是体制机制改革亟待加快，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上升。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增长动力培育主要靠的是市场和企业。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制度较不完善，产权保护措施不得力，创新激励机制缺乏，行政审批事项环节多、名目繁杂，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企业的发展阻力。比如，世界银行2015年对世界189个经济体进行了评估，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3天时间，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字是5道手续和9天时间。另外，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普遍反映，企业税费负担重、社会保险费率高、物流成本增加等，都抬高了企业的发展成本。显然，体制机制成为企业发展创新的主要掣肘。

三是从20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从当年第一季度的12.2%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显然，在现阶段仅仅依靠需求侧调控政策效果已经不灵，还必须在需求侧之外寻找良策。

总之，从上述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供求两侧，但根源和实质在供给侧，而供给侧主要矛盾是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必要也是必然选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

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看，人类经济活动都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组成，供给侧是专为社会生产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方面；需求侧是消费商品或服务的方面。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3种关系：如果社会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能被全部消费，供给与需求实现平衡；若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大于消费，或者小于消费，供求就是失衡状态，这时如果是封闭型经济，要么扩张生产要么压缩需求，反之亦然。如果是开放型经济，就需要进出口调节。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分析和调控经济有两个逻辑框架，一个框架是从需求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另一个是从供给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劳动、资本（投资）、资源和技术等要素投入形成的。有3点需要深入解释，一是需求侧管理侧重于短期增长，供给侧调整侧重于中长期增长。从需求侧看，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采取刺激抑或控制政策，都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供给侧看，劳动、资本（投资）、资源和技术的配置组合形成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需求侧中投资项和供给侧中资本（投资）项有本质不同。需求侧中的投资作为当期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公共投资，也可以是生产投资；公共投资中可以是直接为增加产品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投资，也可以是与产品供给无关的投资。而供给侧中的资本（投资）应当是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紧密相关的投资。三是要素的不同配置结构会带来不同档次质量的产品、不同业态、不同产业。而这些不同主要决定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程度。进一步讲，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是依赖创新完成的，而技术和管理创新又必须依赖体制机制改革去实现。

结合理论和实际情况，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求结构动态平衡、经济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长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加减法”，也做“乘除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去除无效供给，改造传统落后供给，增加新供给；同时不能简单理解供给仅仅是提供产品或服务，还应包括更加集约化配置的生产要素供给和有效的新制度供给。今年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的具体体现。

三、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何区别？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就采取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分别采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推进国企私有化、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等措施帮助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我国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英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5个方面：

第一，阶段不同。英美当年采取供给学派主张时，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滞胀。当前，我国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通缩压力仍在持续加大。

第二，供求环境不同。当年英美面临的供求环境是供给不足，财政赤字压力大，社会福利支出偏高，居民消费率高。当前我国供求失衡，产能严重过剩，面临国内外需求不足、社会居民福利低、居民消费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第三，制度环境不同。英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相当成熟。而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市场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

第四，政策手段不同。与英美发达国家仅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所不同的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可以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又可以采取产业政策和企业激励政策等。

第五，动力机制不同。英美国家采取供给学派主张是，不用在体制上动大手术，而我国要以体制改革为途径，向体制机制改革要动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引擎，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宏观和微观活力，为增加有效供给创造制度条件。

四、需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4对重要关系：

一是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关系。供给与需求两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需求管理政策侧重于在短期内通过相机抉择，实施反周期政策实现供求动态平衡，使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能为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需求侧管理难以自动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通过中长期的科技、制度和管理创新，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新需求潜力。但供给侧在短期内应对经济波动效果有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长短结合，短期需求侧管理要把握好一个“度”，为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搭好一个“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借势改革，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资源培育新增长动力。

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供给必须以需求为目标，需求又必须依赖供给，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就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需求一方。如果供给侧一味增加新产品供给，若需求不变，社会有效需求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还有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以扩大社会福利有效供给为着力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切实提高社会消费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围绕“低端同质、高端不足”，着力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有效需求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着力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更不是万能的，政府与市场必须各就各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新搞计划经济，不能再走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增长的老路，而要痛下决心破除行政垄断，切实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价格引导资源向更富有效率的领域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各级政府在减少市场干预、破除垄断、推进国企改革等方面，要起关键推动作用。在新常态下，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必将降低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本，释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比如，减少或取消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打破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拆除了市场制度之墙，既可以增加生产福利，又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等等。

四是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当今世界，国与国、一国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供给和需求同全球市场的联系比以往要紧密得多。显然，必须在开放条件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妥善协调好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向中高端迈进；既要走出去加强对外投资，又要继续引进先进资本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面对全球化新趋势，我国要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机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将我国打造成全球中高端要素集聚的“高地”，同时推动我国各类要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打造中高要素集聚高地、改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必然要求国内要素供给结构和配置方式进行调整，由此还必须改革相应体制机制，破除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壁垒，主动与全球贸易规则实现有效对接。另外，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制度供给体系建设，为我国进一步“走出去”争取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结构性改革要扎实落地，就必须抓好几个关键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是推动社会创新，根本是深化改革开放。

（执笔：马晓河）

观点速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中国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避免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有根本区别。首先，逻辑起点不同。供给学派兴起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国家深陷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凯恩斯主义失效，由此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大行其道。而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滞胀”，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处在中高速区间，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次，面对问题不同。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病症，当前中国面对的是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侧调整跟不上需求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第三，政策定位不同。西方供给学派解决滞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要丰富得多，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目的是要提高企业效率；提出的“降成本”，与供给学派的“减税”也不同。我们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要点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4个要点：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面临的是通缩压力。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若照搬当年英美国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药不对症。第二，应该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第四，不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未来应着眼于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

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可用的供给侧政策工具很多，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一是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性。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要提高两者的协同性。提高两者的协同性，关键在于做好结构性文章，一方面将结构性税收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总量管理与结构性放松相结合。二是加强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协同性。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加强目标上的协同性。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供给侧政策，都应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预期。尤其是一些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全局的改革举措，应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为核心目标，不能因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变向。三是加强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3个结合”。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第三，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垄断行业改革结合起来。

（以上均为华实整理）

探究工匠精神的本源

王晓明　林雪萍

经济随笔

当下，整个社会都在呼唤“工匠精神”。这反映人们对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的一种渴望。那么，究竟什么是工匠精神呢？工匠精神包含了3个相互独立和关联的概念，即工匠、匠艺活动和工匠精神。

从工匠的特征来看，首先需要有好奇心。其次是专注。毫无疑问，工匠是需要一种技艺上的反复操练和提升。“1万小时”理论，正是对专注的最好注脚。工匠通过匠艺活动，实现了个体的成长。在工匠这一系列成长过程中，在相关行业协会获得各种资格认定、等级评审、培训等，当然也包括一系列的社会约束，使得工匠活动的社会效果日益明显。工匠在协会这种社团机构中，获得了专业技能的等级评定。此外，消费者在商品选择中，完成了对工匠活动的肯定或者废弃。具有工匠精神具象化的产品，被优先得到青睐。这就促使工匠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可以说，工匠精神是源自工匠个体的行动，但却是通过社会反应来获得评定，并最终通过消费者来实现价值。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既有赖于工匠实现匠艺活动的空间（包括工具、工厂）的交互活动，也依赖于社会和消费者的反馈体系。

现代工匠精神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萌芽，继而在工业化发展中，得以锤炼的一种集体型的精神状态。

从市场来看，一方面，不宽容爱维权的消费者和慷慨的“粉丝经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力量，形成了惩恶和扬善的直接倒逼机制；另一方面，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都对质量和匠心有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也是当下为什么消费者普遍关注“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工匠精神不是能呼叫出来，而是需要被培育出来的。比如，如何建立完善的工业信用体系、奖励质量大师，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如何通过制度顶层设计，转变“重装备、轻技工，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的观念，形成培育工匠精神的保障机制，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着力点。此外，加强行业学会协会的力量，亦是题中应有之义。行业协会学会的知识引导、标准建立、工程师资格认证、教育培训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工匠精神”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总之，工匠精神不是个体的光芒，而是群体文化与商业机制的结晶；工匠精神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靠培育和引导才能实现的；工匠精神不是道德与情操的伴随物，而是社会集体约束、身份认同的社会化产物。建设工匠精神，是工业软实力构建。（作者单位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知识中心）

本版编辑　欧阳优